

罕见的元人文集《鳌溪周先生文集》与《云山一懒翁集》

杨 讷

前些年我与陈高华等同志合编《元代农民战争史料汇编》，当时虽尽力搜集，终以条件限制，仍有不少缺漏。《汇编》出版不久，蒙周清澍同志赐阅他本人珍藏的《云山一懒翁集》，最近又得览江西省图书馆收藏的《鳌溪周先生文集》，收获不小。两书均属罕见，故略作介绍，俾学界利用。

一、鳌溪周先生文集

本集共四卷，周闻孙撰，清嘉庆十一年（1806）重刊，衍庆堂藏板。卷一文，卷二诗，卷三诗、词、铭，卷四附录。

闻孙字以立，江西吉水人，《元史》无传。据本集卷首邹缉序及卷四李汶撰墓志铭、解缙撰墓表，他生于大德十一年（1307），至正元年（1341）乡试中选，赴京会试不利。以揭傒斯荐，入史馆。论修宋、辽、金三史，主张以宋为正统，与主事者不合，辞归。先后任鳌溪、贞文、白鹭书院山长，人称鳌溪先生。至正二十年（1360）病故，年五十四。

本集陆峻岭编《元人文集篇目索引》未著录，王德毅编《元人传记资料索引》亦未采用。王书中周闻孙小传虽引邹缉序，实际上转录自《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七四《别集类存目》一《鳌溪文集》条。《提要》称闻孙“所著书二十卷，无复存者。此本乃明正统壬戌其曾孙翰林院侍读叙所辑，仅诗文各一卷而已”。

今日所见嘉庆间刻四卷本，为周氏后人重辑。

集中诗文，如邹缉所说，为闻孙“晚年所作”。其中有关元末史事的，有卷一之《上全参政第一书》、《上全参政第二书》、《义士罗明远庙碑》、《代郭敏则祭义士郭楚金文》、《义士何君成子功绩序》、《赠宋君良玉谒平章陈公序》、《省委官掾吏陈君纪功序》、《赠宋君良玉之临江谒子静太守序》诸篇。

全参政即全普庵撒里，高昌人，至正十六年任江西行省参知政事，分省于赣州。十八年陈友谅兵围赣州，普庵撒里自杀，事见《元史》本传。闻孙上普庵撒里两书写于至正十七年，从中可见当时江西中部的战争形势与红巾军、元军的力量分布。

《罗明远庙碑》叙述了至正十二年闰三月红巾军攻占吉安的过程，我们在编《元代农民战争史料汇编》时从《宣统庐陵县志》抄出。

最可注意的是《赠宋君良玉谒平章陈公序》。文章起首说：

中书平章政事陈公节钺镇豫章，政修令行，乾闿坤辟，人心大和。百司庶府，奔走率职，羁旅草野，咸延颈争先，思有荐献。公皆量材录德，小大毕陈其能。

这个“中书平章政事陈公”是谁，闻孙未道其名；但熟悉元末史事者不难看出，此人即陈友谅。陈友谅从至正十七年秋杀倪文俊以后不久任徐寿辉天完政权的中书平章政事，至十九年末方改称汉王。从内容看，闻孙这篇文章应是写于十九年。

闻孙此文以与宋良玉一问一答的方式称美陈友谅，竭尽歌功颂德之能事。他称友谅为“命世之雄才”，说“平章公之临江右也，政以惠民为本，武以止杀为先”。他甚至夸大友谅兵力说：

“平章公以仁义行师，东略青齐，西举关蜀，南浮江汉，而北耸幽燕，不逾月而江右数十郡县拱手听命。不战而屈人兵，其道无以进乎此矣！”事实上陈友谅的兵力从未抵达青齐。

几年前，我在《天完大汉红巾军史述论》（载《元史论丛》第一辑）一文中根据当时掌握的材料指出：“陈友谅把争取和依靠

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及元故官的支持，作为政权建设的一个主要目标”，他“对地主阶级士大夫的优遇，博得了一部分地主阶级分子的赞赏”。可以说，周闻孙的文章进一步证实了我的判断，尽管现在还无法知道这位霁溪先生是否像解缙的父亲解开那样在陈友谅处供职。

《赠宋君良玉之临江谒子静太守序》中之临江“太守”子静，姓定名住，《同治临江府志》卷一五《杂类志》有他的小传，说他“伪汉时守临江”，死于陈友谅、朱元璋鄱阳之战，又说他“虽武人，而好延揽儒硕，文宗六朝”。从周闻孙的文章可以知道，定住尝与闻孙“同贡”，“擢高科，为名进士”，并非一个武人，而且先为元官，后来才转为陈友谅所用。至于周闻孙对定住的武功与政绩的记述，这里就没有必要再引了。

二、云山一懒翁集

本集三卷，附刻一卷，姚瑱撰，清乾隆五十六年（1791）刊本。卷一文，卷二、三诗。

瑱一名廷用，字叔器，安徽歙县人。生卒年不详。早从胡炳文游。历任紫阳书院学官、松江青龙镇儒学教谕、杭州钱塘县儒学教谕、太平儒学教谕，又曾摄当涂县事。至正十二年（1352）随元江浙行省参知政事（实为假授）董抃霄追击红巾军于徽、杭之间，任理问所知事，后领元帅府事。至正十六年辞退，携家入山，结茅为庐，自署云山一懒翁。至正十八年十二月，朱元璋抵徽，瑱与唐仲实同被召见，事见《明太祖实录》。

本集《元人文集篇目索引》、《元人传记资料索引》、《四库全书总目》均未著录。集中诗文涉于元末史事的，主要是卷一之《上参政董孟起书》与《上参政董孟起十策》。董孟起即董抃霄，《元史》有传。瑱所上两书大约写于至正十三、四年，因抃霄于十四年九月即以枢密院判官从脱脱攻高邮，瑱文又有“今上

御极才二十年”一语。所谓“十策”，即占天文、相地势、察虚实、明顺逆、选偏裨、练士卒、公赏罚、勤给饷、招勇敢、防奸邪，其中不乏对时势的分析。最令人感兴趣的是“明顺逆”一策对元朝帝师制度的抨击，其文云：

今天下之乱，在国家无故自树一不顺之名号，以加妄诞之人而启之。本朝自起龙朔一区宇，殊方绝域靡不臣服，亘古以来盖未多有，非真所谓皇天而下一人耶？无故而特尊一帝师，已奇矣；又无故而加之号曰皇天之下一人之上，则天下其孰不曰一人之上更自有人也。而究所为帝师者，不过事佛之教而止，则天下又孰不曰帝师之上又更自有佛也。于是群雄之窥伺而思逞者曰：“吾亦伪为佛而已。吾伪为佛，为佛最上一乘，定光、弥勒而已。彼帝师者尚能惑御世之天子，而吾弥勒、定光岂不能愚风偃之小民？况帝师之徒纵横驰驿，追逐男子，奸污妇女，秽不可言，而吾戒吾徒恪守戒律，不杀不淫，天下之人其孰以我为非真佛者哉！”于是兴造讹言，燃香致众，愚民蠢蠢，一啸百聚。因而淫名越号，破制削法，鼠穴正衙，鱼鼎纪年，远近之人投名送款者惟恐或后。……今日之事诚由国家之敬礼者非其人，尊称者无其义，而先导天下以逆故也。愚以为帝师可诎也，帝师之徒尽可诛也，

元朝尊崇吐蕃佛教。忽必烈先封吐蕃萨斯迦教派法主八思巴为国师，后又升其号为大宝法王、帝师，称“皇天之下，一人之上”，把帝师看得比皇帝还要高。八思巴之后嗣者历称帝师。帝师徒众倚仗权势，作威作福，横行不法，每每遭到汉族知识分子的抨击，但像姚瑱这样公然指斥帝师制度，明言帝师“可诎”、其徒“可诛”的，我尚未看到有第二个。而且姚瑱还把农民起义领导者利用宗教组织，托称定光佛、弥勒佛的做法说成是元朝皇帝尊奉帝师的结果，其说虽然牵强，却要有点勇气。本集薛案序称瑱“若使早遇我高皇帝，攀鳞附翼，定出宋（濂）、王（祿）

二学士上，而与青田（刘基）比肩”。如果单就直言抨击元朝弊政而言，姚珏这篇文字所表露的锋芒在《诚意伯文集》中亦难找见，更不要说《宋文宪公全集》和《王忠文公集》了。

作者工作单位：北京图书馆

《徐坊和他的归朴堂藏书》补正

沙嘉孙同志《徐坊和他的归朴堂藏书》（《文献》1987年第3期）一文，说“1916年到1926年，徐坊死后的十年中，他的全部藏书还保存完好。”与笔者所见有出入。一，在徐坊生前，其藏书就一度散失，沙文没有提及。李盛铎《木樨轩藏书题记及书录》记宋婺州市门巷唐宅刻本《周礼注》下云：“频闻庚子（1900年）之役梧生书有散失，余与梧生不时晤，亦未以此事质之。今岁重阳前三日，抱存（袁克文）走伴相告，谓得宋本《周礼》，展观之，即梧生故物。乙卯（1915年）重九日。”庚子之役指八国联军攻陷京师，徐坊扈从两宫至西安，其京寓藏书在此时有散失。二，徐坊寄籍于河北定兴，所以他的藏书分藏于定兴和京师两处，沙文也没有提及。京寓所藏多珍善本，徐故后归其长婿参议院议员史宝安，在1916—1926年间就已有散出，流入坊贾和藏书家手中。傅增湘在癸亥（1923）、乙丑（1925）年就收藏了徐坊的《乐全先生文集》（旧写本）、《前汉纪》（明刊本）、《忠文王纪事实录》（宋刊本）、《汉隽》（宋刊本）、《致堂胡先生斐然集》（旧写本）等书（见《藏园群书经眼录》1152、246、359、522、1223页），除了沙文所提到的傅增湘外，当时另有一大藏家李盛铎的木樨轩也收进了不少徐坊的藏书。其藏于定兴之书，1927年后散出，傅增湘致张元济札云：“徐氏书在定兴所存全售出，得四万六千元，书已到京。然暂不出售，闻拟一总收买者方议价。”（《张元济傅增湘论书尺牍》1927年6月30日）后由北京文奎堂书店、待求书店、孔群书店、宝文书局四家合股收购，分别散售。

另，沙文中提及的明刊许氏校本《大戴礼记》护页上徐坊的题记“壬子（1852）春，坊记。”少算了一个甲子，壬子当是1912年，方与徐氏年代相符。

• 刘汉忠 •